

莫让风雪阻挡“西行路”

姚檀栋委员呼吁：生态补偿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抓手

本报记者 杨雪

■两会声音

“国家应该如何整体布局生态补偿机制,这和‘一带一路’战略密切相关”。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院士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抓手,其中对青藏高原地区进行生态补偿应列在首位。

“传统丝绸之路从西安开始,沿青藏高原北缘地区

往西,一直到整个中亚地区,而在‘一带’当中,青藏高原和印度板块、中亚板块也都有碰撞,这些地区都与青藏高原密切相关”。姚檀栋所说的青藏高原是广义的,泛指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所辐射和影响的相关地区。

姚檀栋告诉记者,在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我国其他低海拔地区正以每10年升高0.17摄氏度的速度变暖,而在青藏高原收集到的数据是每10年0.3摄氏度以上。另外,现在青藏高原的降水量呈两极态势,北部可可西里等地区降水量明显增多;而南部减少,其直接后果就是冰川退缩更严重。

“变暖导致冰川融化,引起一系列自然灾害——两极地区海平面上升、山地洪水、泥石流、冰湖溃决等,直接影响下游地区发展”。姚檀栋介绍,易贡湖溃决、四川大旱等灾害都与青藏高原气候密切相关,“最为严重的事件要属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与青藏高原前一年的大面积积雪有60%以上的关联性。”

“青藏高原的降水是由印度季风带过来的,印度季风强降水就增加。由于长期的积雪使反照率增大,把热量反射到‘太空’去了,地面热量减少,季风减弱,但水仍然要降,在青藏高原降不下,就降到东部去了”。姚檀栋说,除了对国内其他地区的影响,作为亚洲许多大河的发源地,青藏高原气候、生态环境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也非常大,例如印度洪水、尼泊尔泥石流等。

姚檀栋认为,对青藏高原地区进行有效生态补偿是一个国际区域性课题,将造福于我国及周边十多个国家甚至更多。如果“一路一带”战略以此作为重要抓手,将会获得多方支持和国际性认可,而所谓新时期“马歇尔计划”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

“虽然国家一直在做生态补偿这件事,对水、草场、森林,但都是一事一议”。姚檀栋指出,诸如“三江源生态保护”“西藏生态屏障计划”的项目有二三十个,但都是碎片化的。“东部地区作为受益者参与进来,拿出一部分GDP来补偿生态”。姚檀栋认为,更重要的是国家的转移支付也应进入生态补偿领域。“建立青藏高原生态补偿机制,关键是国家要有整体规划,或者法制化的思路和布局”。

谈到补偿的具体措施,姚檀栋提出,要保障草场、牧场、环境脆弱农区的载畜量,把多余的人口迁移出来,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要充分利用青藏高原北部降水增多的机遇,“例如,瑞士就做得很好,他们在冰川下游就建有小型水电站”。

“还有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观的扭转,在政绩评价导向,对生态文明建设应占重要地位”。姚檀栋认为,在政绩评价体系中,应添加环境指标“EDP”。

(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

改革怎么走 委员等着看

本报记者 高博

3月4日的一场政协科技界小组会上,谈到科技体制改革,科学家们显得比较冷静。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资助科研,但饱受诟病:一是产出不足;二是“跑部钱进”。科技界多年呼吁后,2014年国务院3月下发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管理的若干意见,12月下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被称为近年最大的科技体制改革动作。

头一天政协小组会上,许多科学家都谈到了改革,但他们现在更关心的,是快点过渡到新的管理体制下,不要耽误科研项目实施。

纳米科学家朱星委员说,因为改革实施细则未确定,自己所在的大学,本该去年底制定的本年重大项目规划,现在还耽搁着。

“一方面科研人员嗷嗷待哺,一方面国家财政有很多经费要发出去,但现在中间环节有问题。”朱星说。

中科院的物理学家张新民委员和其他几位委员,也同意这一点。张新民表示,因为改革细则不明,他们

目前的科学专项规划停下来了。

“今后什么人管项目,独立的管理机构怎样避免贪污或浪费,主管部门还没有一个最终的说法。”朱星说。

“政府不管项目了,管项目的中心照样可以腐败;‘二政府’可能更难打交道。”李子颖委员认为。

贾德昌委员说,之前的制度也有监督管道,但存在“执法不严”。改革后,管理者能否严格执法,建立信用机制,这才是关键。

政协会上也有许多人称赞此次改革,比如一直推动科技体制改革的九三学社中央就表示“彰显了深化改革闯难关、啃硬头的坚定决心,广大科技工作者备受鼓舞。”不过,科学家们盼望的另一笔钱——稳定支持经费,这场改革未给出许诺。

“政府改革的出发点,是增加产出投入比,关心的是项目绩效。”周玉梅委员说。

而科学家的一大愿望,是增加稳定支持经费,简单地说是涨工资,让他们轻松做研究,而不是靠项目经费维持体面生活。但政府此次改革不涉及这个。

尹卓委员在今天的会上说,近年之所以科学家1/3时间做科研,2/3时间跑项目,跑评奖,跑晋升,就是因为没有给做基础研究的人足够的支持。

“现在的科研管理制度,遏制了基础科研的生存空间。拿不到项目就没有成果,科研人员三五年没有成果就靠边站了。”尹卓说:“基础研究不是一年两年能出成果的,可能得十年八年,但那是给我们国家科学打基础的。不要让科学家为柴米油盐的事发愁。”这一意见不新颖,历次两会都有科学家提出,但迄今有望实现。

周玉梅说,她几年前就开始为此次年递交提案。但后来财政部的回复让她了解到,这不是财政问题,而是涉及到国家人事制度。“人社部很难为这一小群人单开一个口子。”周玉梅对此表示理解。

在往年两会上,记者曾经听一位委员说,“国家把科技人员工资涨上去,那么教师该不该涨?医生该不该涨?这不只是科技界自己的事情。”

(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

一份提了十年的提案：“龙滩”何时才能通航？

本报记者 王延斌

交通部水运科院苏国萃委员准备提交一份提案。十年来,这份提案他年年提,但问题至今未获解决。

苏国萃说,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批复内容,始建于2001年7月的龙滩水电站须建设配套的通航设施。但在水电站主体工程建成之后,通航设施迟迟不见踪影。从2005年开始,苏国萃每年都以提案的形式关注此事。十年过去了,他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通航设施要后建”。

“不论是后建,或者是缓建,十年了,都成了敷衍。实际上就是不建。”苏国萃说。

在苏国萃看来,龙滩水电站所在的西江是西南欠发达地区连接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能源输出“生命线”,当地煤、磷、铝、石灰石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其中贵州煤炭储量330亿吨,可就近水运的储量92亿吨;而下游珠三角地区能源、原材料短缺,需对接迫切需要便捷的运输物流渠道。”

苏国萃说,水运有得天独厚优势,“水运运输量大且价格便宜,一条船可以运2000到3000吨货物,一吨每公里4到6分钱,公路几毛钱,铁路要一毛钱”。

这些,都需要通航设施配合。不过,龙滩水电站通航一直悬而未决。苏国萃告诉记者,为了解决通航难题,“翻坝运输”成为一种无奈之举,其操作方法是,在水利枢纽的上下游分别建码头,中间用陆路运输的方式,“但这一翻,水运的成本也就上来了”。

“航运与水电关系向失衡。”苏国萃说,“在枯水季节,水力发电与航运的矛盾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比

如一些电站的发电调峰经常造成船舶搁浅”,“水电枢纽设施及其配套工程,涉及交通、水利、电力等相关部门,这就造成了多部门利益交织,管理体制不顺,导致航道无法满足航运要求。”

2014年12月28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正式颁布。“新《航道法》对我所反映的问题有了明确说法。”苏国萃看到了一些希望,“各级主管部门严格按照《新《航道法》》依法行政;对于国务院、发改委已明确批复由水利水电部门投资兴建的通航设施,须由投资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本着向管理要效率的原则,统筹协调各方利益,明确管理部门。”

“我希望,这次能够解决问题,不要再提了。”苏国萃说。

(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

俞敏洪的三个忧虑

本报记者 张佳星

“全国大移民时代,唯独受基础教育的孩子被‘钉’住了。”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委员对家乡孩子的状态很忧虑,“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学习,才是最值得担心的。”

“回家乡上高中才能参加高考,孩子被不得已的改变荒废了。”在3月4日的小组会上,俞敏洪讲起家乡那些流动人口子女返回户籍地后的遭遇以及心理变化——教材不一样,环境不一样,突然没有父母管了,这些共同

在一个青春期的孩子身上发酵出厌学甚至不良的习气。

“为什么不能在当地上学,直到回户籍地参加高考和录取?”俞敏洪认为,这要真正实现全国高考“一盘棋”,但在地域色彩浓厚,“教育的分封固守与融合时代有所脱节”。

资源不融合是俞敏洪的另一个忧虑,“教育均衡问题,绝不是指是否用一样的教材上课,也不是是否在同样条件的教学楼上上课,而是指优质的教师资源均不均等”。

“在农村教书的老师应该比同一地区在城里教书的老师工资高20%—30%。”俞敏洪希望用收入的杠杆解决教师下乡“遇冷”的问题。这是他连续三年提议“形成优秀教师到农村教书机制”中一个相对短平快的方法。

移动互联网让优秀教师可以用“身不到影到”的方式教书。但线上融合的推进缓慢同样为俞敏洪所忧虑。

“这个工作是民间组织在做。”俞敏洪此前多次参加友成基金会组织的北大附中、北京四中、新东方老师的视图声音传到贫困地区中学的活动,“教育信息化靠零打碎敲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的布局。目前,这个方面政府似乎还没有考量和行动。”

(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

李彦宏委员：从强调政府不要做什么到要做什么

■代表委员访谈

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 (记者王飞)“过去谈企业创新,我都是强调政府尽量不要做什么,多给企业松绑,但这次提出希望设立国家层面的‘中国大脑’计划,是我第一次主动要求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做什么。”百度CEO李彦宏委员在今天的政协小组发言时谈及自己的创新观念变化时言语诚恳。

据李彦宏介绍,“中国大脑”计划其实是做一个“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即以智能医疗诊断、智能无人飞机、军事和民用机器人技术等为重要研究领域,建立相应的服务器集群,支持有能力的企业搭建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和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平台

开放给社会各个层面,包括科研机构、公司,甚至是创业者,让大家在这个大平台上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和创新”。

事实上,百度是近年来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最多的企业之一,目前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研究积累、应用实践经验和科技创新投入较发达国家均有较大差距。如何迎头赶上则是李彦宏一直深入思考的问题。工程师出身的他喜欢从工程的角度来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和项目的发展。李彦宏表示,美国政府发起组织的登月项目“阿波罗计划”给了他很大的启发。

“这个计划耗时10年,包括约3万家企业,30万从业人员,花了255亿美元。表面上看登月计划没有产生

实际作用,但其实国家持续、稳定的大规模基础性投入,让一大批企业成长起来,并产生越来越多的创新。因特尔这样的公司,就是受益于它,全球创新中心硅谷的兴起,也与之有关。”李彦宏认为,“阿波罗计划”的成功让他意识到政府在组织实施重大前沿技术项目中所发挥出来的重要作用。

对于“中国大脑”计划,李彦宏坦言,百度一家公司没有能力建设这样一个体量巨大的基础设施平台。他解释说,百度现在只有一个“百度大脑”项目,其中只包含几万台服务器,而真正要达到“中国大脑”的层级,需要有一个几十万台服务器的技术架构。当研究者要想做更大规模实验的时候,就可以在国家提供的平台上来做,研究者可以更低成本去做更多的创新。“国家层面的‘中国大脑’计划不仅可以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还可以有效地发挥协同创新效应,从而带动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整体创新。”

记者在近几年参加的政协小组会上,常听到委员抱怨相关部门对提案回复空洞,千篇一律。也有在政府中任职的委员认为,一大原因是很多提案“盲人摸象”,缺乏调研,质量低。

许强说,为提升质量,应该“各个界别加强协同,共同调研,一起针对大事情做些提案”。

但许强也说:“以前做省政协常委,每个季度都有调研考察,接触基层机会非常多。现在到全国政协感到没什么事情干。每年大家开一次会,所谓‘月主席,季常委,年委员’,这个现象非常普遍。”

科技厅长的两会日记

唯有行动才有意义

周国辉

3月4日 晴

除了上午参加简短的预备会外,继续做审议准备,接待频繁的媒体采访,包括央视、新华社、科技日报、浙江卫视等等。采访形式随意,不呆板。你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选择沉默,不强求,这应当是一种很好的新闻趋向。采访的记者都很年轻,但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好多时候采访变成了开放式的交流讨论。这样的感觉很好。

明天(3月5日)是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的纪念日,浙江卫视两位记者就此采访我,本希望发表一点感言,最后变成了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意义、怎么加强社会特别是青少年道德建设的讨论。雷锋作为榜样,产生在五十年代,代表的是中国新的精神和道德标杆,我们这一代都是在雷锋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自然有特殊亲切感。但我以为,在改革开放的当今,雷锋精神的主体,包括对他人的友善、对事业的执着、对祖国的挚爱、对社会的奉献,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抑制物欲横流是永远的正能量。正如总书记指出的:“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

学习雷锋,要立足本职,化为行动。这方面,我要

特别倡导一下浙江大学阮俊华老师二十载之功打造的“彩虹人生”公益行动,包括有80多名优秀浙商为导师的“雄鹰计划”和有数十位资深厅局长担纲的“紫藤计划”。打破高校思政工作单一的课堂教育、单向灌输、说教方式,代之以开放、互动、体验和实践的方式,不仅深受青年学子喜欢,而且导师们也深受教育。我也是在短短几月的参与体验中认识到,这个以理想塑造人生彩虹的社会实验,旨在使人生像彩虹一样丰富、精彩、有意义,造福社会、造化自我成为参与双方的共同追求。在这样的感悟下,我觉得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变得年轻了。于是,在“彩虹人生”的跨年活动中,我作了“我喜欢看孩童从口中吹出彩虹”的演讲。

道德是思想支配的,但唯有行动才有意义。人的高度不仅在于有会思考的头脑,而且在于有会行动的双手。

知行合一,是学习雷锋和思想道德建设最基本的要求。

(作者系浙江省科技厅厅长)



3月4日,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在驻地参加小组讨论,审议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图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委员利用小组会议间隙就“关于加强卫星遥感在西藏生态屏障保护与建设中的应用”等政协会议建议提案接受媒体采访。

本报记者 洪星摄

Duang! 提案还没交,就“办复”了

科技日报北京3月4日电 (记者高博)4日的全国政协科技界小组会上,许强委员告诉大家,他来北京开会前,准备了一份提案,正好碰上相关部门。对方打听了提案内容,表示可以立即答复。

“提案还没提,已经给我回答了。”许强说,“其实

他们早就准备了很多答案,‘直接给你拿一份就行了。’”

许强说,一些部委每年应付一千多提案,办起来麻烦,就敷衍了事,这样“不仅耗费委员的人力财力,也耗费他们的人力财力”。

